

# 乱世中的治世想象

## ——抗战前夕济南书词的勃兴及其文化政治

国家玮

**内容提要** 抗战前夕山东济南书词勃兴现象，应对着人在面对不确定性时的非理性状态（恐惧）被一种对“稳定”生活的共鸣（适应性预期）所克服的心理机制。“五三”惨案带来的恐惧与生存危机、1930年韩复榘履职后将山东当成独立王国经营及传统吏治方式的回归、大观园等大型商城的建立所带来的对“稳定”生活的预期，使济南在现代化建设基本停滞的情况下实现了人口迅速增长及日常生活的“复归”，而书词中活生生的现世现报、青天治国等巩固了土俗世界中“般配”“正经”等仪规传统，成为民众对未来“稳定”预期的心理基础。

**关键词** 乱世；治世；书词茶社；草台席棚；书词

选择抗战前夕（1931—1937）山东济南书词勃兴现象作为考察对象，既不想为戏曲史研究增补空白，亦非在知识生产意义上通过发掘“降一格”的材源而证明区域研究的价值。真正关心的乃是借助对济南一地鼓词听众欣赏偏好的描述，呈现“五三”惨案（1928）、“中原大战”（1930）与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1937）这段时期中国民众的文化/文学生活及人们的精神状态。“书词”的表演空间差异巨大，大明湖畔凉亭雅座与劝业场中动辄每日观众数千的布棚席棚都是听书的去处。这一作为北方城市颇具社会公约数的娱乐方式足以被视为民众对社会治乱预期的风向标，用以探测“沉默的大多数”的精神状态，并最终在勾勒民众精神史的过程中提出富有生发性的概念。

战前的旧京北平，正面临着“怀古的终结”，尝试接受从“帝京到文化城”的身份转变<sup>[1]</sup>，高度现代化的上海亦在纸醉金迷中诠释着何为“摩登”。与这两座名城不同，处于南北交通要道上的济南，刚刚经历兵燹之乱（“五三”惨案）与蒋冯山东统治权之争（最终以冯玉祥两名部下韩复榘及石友三倒戈转投南京政府而终结，作为回报，韩复榘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一职）。极为

克制地推进济南现代化进程的韩复榘，其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皆取保守主义，韩本人极尽可能地塑造传统意义上的青天形象，“赢得了许多中国精英的支持，尤其是华北的保守派。这些保守派不信任蒋介石，他们认为蒋介石是一个军人革新者，而其革新的依据，是孙中山并不令人信服的政治哲学”<sup>[2]</sup>。与彼时沈鸿烈在青岛“特别市”推行以海权、海运、海产、海军救国的“四海主义”及在青岛开展的大规模现代化建设相比<sup>[3]</sup>，因城内除主干道路之外皆为狭窄小巷而被称之为“手推车之城”的济南在现代化建设方面几乎没有成就。对儒家传统道德格外推重与对现代化可能造成的后果的担忧，使韩复榘更愿意以传统社会“父母官”的心态将山东视作自己的独立王国来经营。饶有意味的是，韩的这一策略不仅赢得了精英阶层的普遍拥戴，作为日常生活繁荣程度风向标的书词业在韩当政后不到两年时间的勃兴与几年内20万左右人口数量的激增，似乎也表明一般民众“用脚投票”，对这一独断而保守的施政方针的认可。1931年，大商人张仪亭与北洋军阀靳云鹏订立租赁合同，承租延福堂近45亩地的地上权建立并经营大观园，这可被视为商界精英在充分评估了民众对未来积极预期后所

做的“战略投资”。韩复榘强有力的统治迅速将激进革命（第二次北伐战争在济南的受挫）及外敌入侵（“五三”惨案）带给普通民众的“恐惧”抹去。对于抗战前夕的济南民众来说，理性的、长远的对民主、自由及现代化追求与当下的、短暂的稳定感的获得相比似乎不那么重要。

—

“预期”，乃是借自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分析范畴。在经济学中，“预期”概念的提出被视为对确定环境下均衡分析模式的颠覆，关注的是在不确定情况下的选择决策。“预期”通常被分为“适应性预期”(adaptive expectations)与“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s)。前者流行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者则盛行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两者的分歧主要在于如何看待“预期”本身：“理性预期”假定人们对某个经济现象（如市场价格）进行预期之时是理性的，即人们会最大限度地充分利用所得到的信息来冷静研判目下情况并做出行动而不会犯系统性错误；与之相反，“适应性预期”虽然同样认为人们总是倾向于从自身利益出发行事，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总是会理性判断形势，非理性的、具有从众属性的“希望”、“恐惧”以及“信心”都会影响投资决策。如果将这一经济学分析范畴移用到人文科学研究中，似乎可以认为思想史或文学史书写正是一种站在“后设”立场上，系统性地将某一时代缠杂不清的希望、信心、恐惧等改写为人们理性选择的过程。思想史和文学史往往热衷于选择时代先锋作为“标本”勾勒“发展”脉络而不太愿意沉淀到无主名、无特操且无以用理性直面希望与恐惧的土俗世界之中，勾勒其中普通民众的精神史。对思想史和文学史书写来说，新/旧、现代/传统之类几成滥套的二元对立框架之所以不失为有效的分析范畴，在于其使用一种有等差的同时也是线性进步的言说策略。不必担心沉默的大多数，因为总有“一二士”撩动起指向未来的“星星之火”。与之相对，“适应性预期”关注人们在对未来并不确定之时“用脚投票”的结果并由此倒推其心理机制。

韩复榘以“青天”形象示人、暂缓土地调查进

而保护大地主，若从“理性预期”来看，这种独断专行悍然阻断了济南的现代化进程，但1930年到1932年间涌入济南的大量人口与可测度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书词业的勃兴却隐隐表明普通民众对目的而非手段的关切。对30年代的济南民众来说，对稳定生活的追求远大于革新图变的兴趣，对节庆的执着正是这种追求治世稳定生活想象的表现之一：“热闹”或说“凑热闹”成为勾勒民众心理机制最富生机的概念。其时在济的老舍勾勒民众群像，提及千佛山“香会”。“五三”“九一八”未过多久，而古城济南却是千佛山下“一片神鸦社鼓”。“上海打得热闹”，而正月十五仍要“大闹其龙灯”。国难声中，国庆不庆，乃是政府命令。“国庆之庆与不庆，关心者只有官员与学生，因为有关于放假与否，无望无望”。国庆虽可不庆，但重阳不能不过，于是“烧股高香，买几个元宝（纸的），也到底是有益无损的事”<sup>[4]</sup>。老舍的讽刺自然建基于新文学的“认识装置”：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原始道德感、对世俗幸福的执着追求与神佛信仰等才是其格外关切。无论对于地方豪绅、地主还是普通民众，激进革命对稳定生活这一“信念”或说“希望”来说都是破坏性因素；反之，一仍旧习的社会治理模式迅速唤醒了人们心中的“治世”想象，这一想象轻而易举地被人们安置在自身经验格局之中。

1932年——“五三”惨案后四年，“九一八”事变不到一年，韩复榘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不到两年——足可作为观测乱世中执着追求稳定生活的民众心态的标志性的年份。将山东视作独立王国经营的韩复榘于这年成立进德会，搬出“孝悌忠义、礼义廉耻”，以之为山东军政官员需进之德。如此，进德会几可被视为韩复榘主导下山东省政界、军界官员的道德训诫会，故会务虽虚，影响极大，一种励精图治、重塑正气的政治氛围为民众的“治世”预期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前此修缮的城门与老城区的主要街路、新成立的市政府下属工务局替代私人资本建立的官办自来水公司以及何思源对济南教育的发展等，与此时韩复榘在思想文化上的“作为”，共同推助了“适应性预期”朝着乐观方向发展。

后人对韩复榘的评价，无非调侃其以一武夫却常面对精英“训话”，错谬百出，足以让人一笑。

笑话之外，亦不乏“佳话”，如其常常“微服私访”，动辄“亲自审案”，以救民间疾苦。外报载土肥原秘密抵济活动并迫诱其参加“华北五省自治”，韩还曾登报并致电路透社公开辟谣，而时人亦对韩之不失大节颇有信心<sup>[5]</sup>。凡此种种，可见韩复榘对塑造其“爱国清官”形象的苦心孤诣。个人“正心诚意”方能“齐家治国”的复古方案是韩复榘式吏治的显著特点。依靠官家道德修为的转变，上行下效，从而“化民”，这与现代知识分子主导的自下而上，“立人”而后成事的策略恰好相反。对吏治“道德主义”的迷恋，既使韩所憧憬的“青天”想象不断落实为“微服私访”、允许百姓“击鼓鸣冤”等实际作为，与此同时，这种对官僚私德的要求最终也被韩放大为对鲁省整个官僚系统的道德要求。个人权威及“突击审案”这种激情型的传统吏治模式而不是民主制下庞大而有条不紊运作的官僚体系才是韩更为倾心的社会治理模式。进德会则是恢复这一传统社会“治世”理想的文化实践<sup>[6]</sup>。短短几年时间，总会人数数千人，地方70余个分会会员人数更夥，军队及政府中的各级官僚几乎全部主动入会。《进德月刊》曾分5期连载其会员名单，军界营长以上或政界科长以上的身份方能入选人数并不多的“当然会员”，如果将各地分会会员一并算入，则进入“普通会员”者当十百倍之。“德”是否能“进”，“古”是否能“复”，不好一概而论。不过一省之长借此满足“清明政治”的吏治理想却庶几实现了。对于韩复榘来说，吏治清明的同时，更要与民同乐，不仅民间茶社、布棚、席棚演出少有干预，官方亦要参与到“同乐”中来。官办进德会露天书场、游艺园就此开张。与市政建设及工业生产这类累积物质财富的工作相比，娱乐游艺实在算不得什么创造社会财富的重要活动，可是作为普通市民“评估”生活是否有“盼头”的重要“参数”，“歌舞升平”中释放出的是一种复归日常生活的心理“触媒”。报载“进德会露天书场开幕迄今，月余之久，每日聆音歌迷，争先恐后，趋之若鹜，而其他书场，已告冷落之象矣，盖自济市有书场以来，实属空前之盛举”<sup>[7]</sup>。或鼓词，或相声，真可谓一派盛景。以专车接北平富连成全班人马演出，更是轰动泉城。进德会剧场但有名角，稍稍晚

到，则只望见人山人海，听戏者“满坑满谷”<sup>[8]</sup>。加以游乐园文娱体育各色活动不断，此番经营背后自然不难看出一种于乱世中让鲁省显出治世风貌的良苦用心。津浦路恢复通车、小清河航道疏浚、亲自审案、戒嫖戒赌、严惩贪污受贿、推崇“礼义廉耻”以达民之“孝悌忠信”、不惜重金改善文化娱乐生态塑造百姓安居乐业景象，这种上自官家的“重整河山”的政策信号将一种为民众熟悉的“治世”重新带回30年代初的济南城，同时亦暗合着史传传统中对良吏的道德要求，这是武人韩复榘所能理解的良政良吏的最大限度。与激进革命带来的资源在短时间内重新分配并由此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相比，最大限度维持现状并坚持“日拱一卒”式的保守主义方案似乎是前途未明之时形成社会稳定预期的更受普通民众青睐的方案。因为南京政府对胶济铁路与青岛港收入的把持，韩复榘主政山东期间，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中六成多都是依靠土地税。深得韩器重的老部下王向荣主管山东省财政厅期间专注于征收与全额上缴常规土地税却无意尝试寻找新税源，这一明显有利于地主、富商及官员的方案相较张宗昌时代唯一的优点似乎就是超乎寻常的稳定性或说保守性。朝令夕改或如张宗昌督鲁期间动辄立一名目征税等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以及“五三”惨案对第二次北伐成功这一预期的冲击等，这些对政策稳定性造成威胁的因素在韩复榘重整吏治、将儒家传统“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与民众原始道德及对秩序感的追求等贴合的过程中消解了。等级秩序仍被视为疗愈乱世之“乱”的有效疗法。与“稳定”“热闹”这一触发普通民众“希望”（适应性预期）密切相关的书词，亦在此时出现由小曲到全本大套的转换。1932年对济南书词界的调查显示，全本大套书成为不少茶社、布棚、席棚中“撑场面”的书词。常演剧目包括《全本南北宋》《全本隋唐演义》《全本下南唐》《全本明烈传》《五代残唐》《全本杨家将》《全本精忠传》《三侠剑》等。“就营业的情形说起来，每场每天要说七八段，如果每十日轮换一次，需要七八十段。”<sup>[9]</sup>侠义道的处事原则建基于世俗伦理之上，善/恶、有道/无道、忠/逆仍是最有效的价值标准，它们与韩复榘主张在法律方面的简单、清楚、严格执行如出一辙。《隋

唐演义》中“混世魔王”终归要扶保有道明君，“大五义”“小五义”“明清八义”以江湖绿林身份而为官府收编，除暴安良乃是为了国泰民安这一“义”上之“忠”，故事背景往往不是北宋仁宗朝就是清康熙年间，江湖英雄的最高理想不过是扶保明主、功成身退。全本书既是商家吸引听众的手段，倒过来说亦可被视为某种“市场需要”，标示的是市民娱乐生活的热闹气象。

据济南民众教育社的调查，1932年济南地点固定的书词茶社情况大致如下：

政学界消遣取乐、品茗听书一般在趵突泉附近。此处以茶园茶社为主，偶有搭布棚演出者，几乎不用席棚。具体为：四面亭，唱山东大鼓，每日有观众政学界30余人来此听书；玉兴茶园，唱山东大鼓与河南坠琴，每日有观众工商政学界40余人；民众茶园，唱山东大鼓，每日有观众商界30余人；四季春，唱京韵大鼓，说相声、双簧，每日有观众政学商界10余人，客人不多，但演员数量（男9人，女12人）却远大于那些每日观众数千人的席棚，当为书词茶社中档次最高者；卫生社，唱京韵大鼓、洋琴，演蹦蹦戏，每日有观众政学商界10余人；观澜亭，唱山东大鼓，每日有观众政学界30余人。另有两个布棚，其一说木板快书及评词，每日有观众工界40余人；另一处只说评词，每日有观众工商界30余人。

大型商场附近人气最旺，其中劝业场主要以布棚、席棚为主，人数最多，西市场与新市场多开茶园。

劝业场的情况如下：立奎茶棚，专演评词，每日有观众工界50余人。布棚三个，其一唱洋琴，每日有观众工界30余人；其一说评词，每日有观众工界30余人。其一兼唱洋琴和坠琴，每日有观众工界50余人。最火爆者为唱河间大鼓的席棚，这里每日有农工商观众1000余人来听书词。

西市场的情况如下：文安茶园，唱河间大鼓、说评词，每日有观众农工商100余人；民乐茶园，说木板快书、河南坠琴，每日有观众工农界50余人；四合轩茶园，唱河间大鼓，每日有观众工界30余人；三乐茶园，说评词，每日有观众工界30余人。

新市场的情况如下：双春茶园，唱西河大鼓、说木板快书，每日有观众工商界300余人；义兴茶

园，唱洋琴，每日有观众工商界50余人；玉兴茶园，唱河南坠琴，每日有观众工商界50余人；福兴茶园，唱河南坠琴，每日有观众工商界60余人；光裕茶园，唱山东大鼓、河南坠琴，每日有观众工商界40余人；光明茶园，唱山东大鼓，每日有观众工商界50余人；三民茶园，说木板快书、评书，每日有观众工商界40余人。新市场另有茶棚、布棚5个，每日听书人数大都在百人左右。其中，金霖茶棚，说相声、演双簧，每日有观众工商界100余人。布棚5个，其中，有两个布棚都唱河间大鼓，观众都以工商界为主，一个每日听众200余人，一个每日听众100余人。有一个专说评词的布棚，每日有观众工商界100余人。另有一个专唱木板大鼓的布棚，每日有观众工商界80余人。

除此之外，普利市场有两个茶园：同乐茶园，唱山东大鼓、河南坠琴，每日有观众工商界40余人；广兴茶园，唱洋琴，每日有观众工界70余人。北市场有1个席棚，唱洋琴，每日有观众工界70余人；布棚1个，说竹板快书及评词，每日有观众工界40余人。北城头有4个席棚，一个说相声、演双簧，每日有观众工界80余人；一个说木板快书，每日有观众工商界50余人；两个说评词，每日有工商界观众60余人和40余人。<sup>[10]</sup>

“五三”惨案后，济南人口总数一度从35万降至20万<sup>[11]</sup>，其后不到5年复升至40万之夥。至1936年，济南人口总人口达到43万。这其中济南市居民185199人，同为山东省但籍贯不是济南者则为190962人<sup>[12]</sup>。这与1931—1937年间中国经济陷入大萧条，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村金融机构崩溃以致农村崩溃、大量农民涌入省府济南有关<sup>[13]</sup>。济南市政府1932年对民众娱乐人数所做的统计与推算则表明，九成以上的市民以观看旧剧（包括听书看戏）与电影作为主要娱乐方式。调查是以取样推算的方式完成的，观看旧剧者经过抽样调查，取3个月平均数，为60175人次，推算全年240700人次，占总人数百分比为48.34%；看电影者经过抽样调查，取3个月平均数，为53406人次，推算全年为213624人次，占总人数百分比为42.89%；观看新剧者经过抽样调查，取3个月平均数，为7926人次，推算全年为31704人次，占总

人数百分比为 6.37%；去公园者经过抽样调查，取 3 个月平均数，为 2988 人次，推算全年为 11952 人次，占总人数百分比为 2.4%。调查显示，娱乐场所 3 个月平均接待 124495 人次，按此推算全年有 491980 人次<sup>[14]</sup>。颇有意味的是，可靠的数据显示，1932 年济南市人口总数为 427772 人<sup>[15]</sup>。考虑到济南市政府于 1931 年 10 月 8 日第 78 次市政会议通过并实行的“济南市公共娱乐场所注册暂行规则”中明确要求“凡本市区域内旧有之私立公共娱乐场所无论已否呈报其他机关”而须一律“呈请本府注册”<sup>[16]</sup>，这一数据似乎就更有说服力。

民众向往繁荣生活的信心与将山东省作为独立王国经营，怀有“良吏”想象的韩复榘所施政令形成合力，使“五三”惨案与“中原大战”军阀混战造成的伤痛在某种程度上被治愈了。这似乎印证了谢和耐在对“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描述后所做的判断：“宽容忍让和相信人类天性，均来自对于社会生活之价值的坚定信念，并成为中国人最突出的道德特点。”<sup>[17]</sup>

## 二

新文学家看重民间文学的功用，重新“发现”了歌谣俗曲的价值，可对于书词，大多数人还停留在刘铁云笔下“明湖居说书”一节。真正对书词颇有研究的，大多也注目于平沪两地的情况。阿英在古典小说、戏曲、传记文学这一脉络中发掘书词的描写技巧，与他在上海所听书词多为据历史小说——尤其是《三国》——改编大有关系<sup>[18]</sup>。赵景深于俗文学用功最勤，有《大鼓研究》传世，但此著以京音大鼓为正宗<sup>[19]</sup>。故以专门著作论，专研 30 年代济南叫好又叫座的梨花大鼓与河间大鼓者不多。前文提及 1932 年以民众教育社名义对济南书词业进行的系统调查<sup>[20]</sup>，如果细察，也会发现不少问题，尤其是为要切“改良”与“民众教育”这一主题，反而容易忽略调查对象的复杂。不管是书词茶社、布棚、席棚上报还是民众教育社“分兵派将”做了实地调研，调查者“化民”心切而少有对被调查者“同情的理解”。“口传心授”被认为是早经落伍的传习方式，书词艺人“鄙陋”的行为

也需要经过改善而变得“逐渐高尚”<sup>[21]</sup>。“济南市流行的旧词和新曲”一项所列，不仅有内容的分别，更有所唱调子的差异。抛开所记常演词曲名称和调子诸材料的来源不说，单论材料编目的准确性，将新剧《猛回头》《文明辞》之类列入常演剧目就有些可疑。极有可能是为了将“旧词新曲”不同种类填全，才硬要放进几个“与时俱进”的新剧。说书词仍是以旧词中的历史及社会两类为主自然不错，可一说到各派书词的流传范围，则难免不够“与时俱进”。梨花大鼓流传最广这个判断没有问题，可说河间大鼓只在“河北一部”，流传不甚普遍，此言未免失之草率。在 30 年代的济南，唱白间可自由转换、节奏更为明快轻松的河间大鼓相对调缓制严的梨花大鼓显然更受普通民众青睐。再说常演书词。赵景深曾记 1934 年上海北平书场演出鼓词详目，尤以据三国故事改编者所唱次数最多，《战长沙》在 20 天中所唱次数甚至有 24 次之多。来此听书者虽不一定是来沪避难的北人，但大抵还都要“雇车前往”，也绝不是“短衣帮”。济南的书词茶社，历史题材的本子自然不少，但社会、侠义、滑稽及所谓“迷信”（实为《蓝桥会》一类传奇本子）亦可占演出的半壁江山。此种局面的形成，端赖济南一地，茶园之外，布棚、茶棚、席棚遍地，为招徕客人，除用历史题材的本子说唱之外，自然多唱劝嫖、劝夫或是情节跌宕起伏的侠义题材。

济南民众教育社将常演旧词分历史、社会、侠义、滑稽、迷信五类，依类录之。<sup>[22]</sup>

历史：《八里桥》《昭君出塞》《战长沙》《吕蒙正赶斋》《秦琼辞母》《借箭》《打西关》《刀对刀》《长坂坡》《樊梨花征西》《三下南唐》《打丰县》《三顾茅庐》《南阳关》《江东计》《古城会》《碰碑》《马失前蹄》《华容道》《芦花荡》《叫关》《诸葛亮打狗》《箭射盔缨》《单刀赴会》《造白袍》《斩蔡阳》《董凌关》<sup>[23]</sup>《空城计》《金鞭记》《剑阁闻铃》《河北寻兄》《凤仪亭》《刘公案》《收赵云》《孙夫人祭江》《烧成都》《诸葛亮吊孝》《荐诸葛》《满床笏》《许昌派兵》《刘备过江》《禅鱼寺》《取成都》《三娘教子》《杨满堂征南》《樊梨花投唐》《徐庶辞朝》《听琴》《白马坡》《徐母骂曹》《游武庙》《定军山》《梁

山伯下山》《双锁山》《全本南北宋》《全本隋唐演义》《全本下南唐》《全本名烈传》《呼家大报仇》《五代残唐》《全本列国》《全本杨家将》《全本精忠传》《马潜龙走国》《辞曹》《白帝城》《柴桑口》《黄文下书》。

社会：《清官断》《王汉溪借粮》《空棺计》《皮袄计》《下苏州》《马前泼水》《王休休妻》《高定宝招亲》《白猿孝母》《苏三起解》《双奇文》《五子登科》《洪武放牛》《潘金莲拾麦子》《大烟叹》《王允休妻》《大西厢》《改良劝夫》《宋江坐楼》《鞭打芦花》《金钱记》《丁香孝母》《郭举埋儿》《九子父》《秦雪梅吊孝》《改良劝妻》《贾母探病》《三堂会审》《樊梨花》《劝嫖交友》《鸿鸾喜》《祝英台》《海公案》《败子回头》《马寡妇开店》<sup>[24]</sup>《灯下劝夫》《龙凤配》《春秋配》《双别窑》《女起解》《陈三两爬堂》《王定宝借当》《老少换》《黛玉悲秋》《宝玉探病》《独占花魁》《妓女从良》《双锁柜》《玉环计》《武家坡》《白绫扇》《晴雯补裘》《乌龙院》《黄爱玉上坟》。

侠义：《三侠剑》《闹江州》《李逵夺鱼》《永庆升平》《彭公案》《小八义》《平六国》《黑虎传》《施公案》《魏延抢法场》《宋江发配》《张飞赶船》《王庆卖拳》《五虎平南》《王天宝》。

滑稽：《黑牛段》《翻车》《拐马车》《黑驴段》《李存孝夺蒿》《三怕老婆》《摔镜架》《小秃闹房》。

迷信：《胡迪骂阎》《做多罗》《湘子上寿》《日逢三喜》《长生乐》《阴功报》《栓娃娃》《阎王庙》《蓝桥会》《活捉张文远》《金山寺》。

京韵大鼓、梨花大鼓、洋琴及评词似乎更受政学精英青睐，而河间大鼓则拥有最多观众，这些观众以农工为主。如前所述，这与彼时济南激增的外来人口密切相关。与上海书场三国书词占据大半江山相比，济南的书词茶社、布棚、席棚中所唱曲目既重历史，又重市井百姓日常生活；既有可演一刻钟或半小时的小段，同时也有不少“全本”，连演两三个月之久。词书研究与戏剧研究相类，剧本文学史与演出史最好分而论之。《大烟叹》《妓女从良》，从名目上看，讽世与劝世之功兼备。不过，真到茶社、布棚、席棚中演出，鼓姬自有发挥。顺便提及，就

1936年的统计来看，其时济南书词艺人男女比例已经非常接近，与戏园中情形不可同日而语。类似《黛玉葬花》《苏三起解》《小二姐做梦》《马寡妇开店》这类书词，专为鼓姬量身定做。小段大抵情节简单，端赖鼓姬拿捏分寸，看人下菜碟，尺度可松可紧。

以多次被平沪两地禁演却能在济南常演不衰的《马寡妇开店》为例。白面书生、孀居娘子，又加以漫漫长夜。虽则男主角狄仁杰最后“讲今论古”而“苦言规劝”，不淫人妇，以至积下阴功“南天门一改状元图”，但马寡妇殷勤伺候读书，倾诉寡居生活之苦以及百般挑逗书生的桥段才能真正招徕看客。无论是书词茶社还是布棚、席棚，来此听词者以男性观众为多。故此，书词唱本自然也多以男性视角展开。不过，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唱本构成了一个有趣的倒转：不道德借助道德使自身变成了伪道德，而伪道德又使这类书词在演出时变成了彻底的闹剧：在马寡妇表现出最为旺盛而炽烈的情欲之时，书生毫不留情的喝止给马寡妇带来的尴尬，往往会引起哄堂大笑。情欲戏很快变成了喜剧，最终再以道德劝善作结。情欲、道德、笑料，这三种质素往往同时出现在一个唱本之中，《马寡妇开店》不是特例。在土俗世界之中，“荤口”从来不仅仅是对情欲大胆赤裸的描写。“荤”要融入“笑料”之中，才显“轻重平衡”。男性看客在对寡居女子身世之感的窥视中满足欲望，但导泄这一欲望的恰恰是作为欲望对立面的道德，对女性“正经”的道德规训最终在对“不正经”的赏玩中完成。如果说，土俗世界的“仪规”传统暗合了群体观念“绝对的、毫不妥协的和简单明了的形式”，那么这些以“仪规”作为道德遮羞布的书词则更为生动地表征了因为“在这些形象化的观念之间，没有任何逻辑上的相似性或连续性”所导致的“最矛盾的观念在群体中同时流行”<sup>[25]</sup>这一事实。

### 三

同样处理道德、欲望、死亡这类话题，且都取资于传统文化，新文学作家更倾向于在六朝志怪、唐宋传奇以至“《法苑珠林》所引诸经”中加入一点“现代”的味道，显出老手的气息。道德、正义、

信念恰如弹簧般可随一时一地人之处境的不同而变得可伸可缩，倒是情欲成为人自身无法以理性体察与控制的神秘之物。命运的不可知、情欲的不可控、与死亡的不期而遇，道德的救赎功能因此被削弱。书词中对类似话题的处理方法正好相反，“果报”观承认有超验的“天命”存在，因此将人的行动赋予了道德的边界——不忠不义者必遭天谴。书词《张郎休妻》中，张云方与情妇李海棠的私会同样因为情欲难遏，但他毒打发妻陈丁香以至最终休妻，乃是因为丁香无法受孕生子。此番举动的果报是火灾导致张云方双眼烧瞎只得行乞度日，再遇早已改嫁到姚家，但仍不忘旧情的丁香，最终惭愧不已，碰死在灶台边。同样因为情欲而悖伦，与新文学作家将死亡神秘化的倾向相比，书词中张云方的暴戾、欲望以及因良心发现而自我了断，都被置于道德的审判之下。

茶社席棚中所唱与“苦心征集并顾曲笔记”而成的“鼓界完全善本”不同。既求“善本”，难免以学者眼光衡量取舍。实地演出则不同，要的是叫好叫座，观众的趣味才是最重要的。对于“文明书词”，则其“写实”一部，自应多以“劝诫”“救国”名之。同时，亦要兼顾“观风”效果。《小佳人送饭》、《情人顶嘴》之类庶几有“乐而不淫”的现代诗教意味。与之相比，茶社、布棚、席棚演出，虽也不乏“大烟叹”与“败子回头”，但《郭巨埋儿》《老少换》更受欢迎。这类书词故事较新文学作家中谙熟乡村或城市底层生活者所写更为阴惨：埋儿孝母、麻袋装民女以四两银钱出卖。乱世悖伦，斯文扫地，倒是不难理解。只是书词往往将“去道德化”的阴惨故事与“道德救赎”的情节这两个极端并置。埋儿并不足奇，饥饿难耐，“易子而食”也常有，问题在于如果被置于“孝”这样的道德拷问下，“埋儿”庶几成为一个无解的伦理难题。毫无疑问，郭巨此举当然会“感天动地”，埋儿掘土却挖得黄金白银。更容易的是，就此为书词传统贴上“大团圆”标签讽刺了之。如何处理人欲与道德之间的关系，经典的“五四”式答案自然是在灵与肉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sup>[26]</sup>。不过，像鲁迅这样兼具文学家气质与思想家气质的作家或是老舍这样拒绝对民众真实生活“隔岸观火”的市民作家常常会质疑“灵

肉合一”论对民间复杂文化生态阐释的有效性。阿Q的爱情观，《茶馆》中当了十几年兵的老陈、老林合娶一个媳妇，凑“三个人的交情”，皆表明两位作家面对土俗世界相当复杂的文化生态时发现真问题的敏锐眼光。所谓“启蒙”，一般人更关心“启”什么、如何“启”。至于“蒙昧者”何以“蒙”，在布道式的“启蒙”结构中是较少被关注的。在这个脉络中理解书词，不难发现，与新文学名目繁多的启蒙话语相比，书词对民众的教化建基于果报逻辑的劝善式道德主义之上。恰恰如此，纷繁多样的书词题材才打开了欲望危机下土俗世界这一巨大而复杂的空间。在其内部，对道德主义的追求与去道德化的行动是一体两面的东西。

以书词《老少换》为例。抢民女以四两银钱出卖的故事本就底色阴惨，以此为背景讲述的被修改了的“郎才女貌”的故事虽以大团圆作结，但毕竟不同于一般才子佳人的文人套路。同为“才子”，文人笔下出之往往形象典重，书词中的“才子”却既做了乘人之危、买来民女的勾当，又缺少担当，遇事大哭不止，斯文扫地。刘进以同乡之交赶来劝解，出自真心，却又不顾同乡情谊，为图女色背信弃义。行事的狼狈怯懦，庶几符合布棚、席棚中“短衣帮”对文人的想象。老者刘进，很难以道德名目借善/恶之别对其形象进行描述——见同乡落难心生同情；觉察“老换少”后算计自家利益受损而决不罢休；被恫吓后妥协最终与老妇同归。凡此种种，与其置于善/恶的二元框架内进行道德判断，不如将其放在个体利益之秤上掂量一番。老妇与店小二代表了一般民众理解问题的视点：在很多情况下，“庸众”未必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会以维系土俗世界运行的、在民众心中约定俗成的价值公约数守望“民意”。这种“民意”天然缺乏深度和思想应有的批判性，但作为“仪规”，却往往能在民间起到一呼百应的惊人效果。无视王辅臣将民女装入麻袋如商品般售出；无视书生和富贾为求情欲满足而趁火打劫，如买商品一样买来女性身体；无视书生背信弃义，乘人之危，将本为劝解自己的刘进灌醉掉包。是否“般配”在此成为民众度量此事时使用的最大道德/价值公约数。民众因为男女主人公不“般配”而义愤填膺，同时又因为掉包成功而化解

了焦虑。布棚、席棚中听书词的市民或外来谋生的农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获得了与店小二之流共同的道德快感。

如果说新文学作家更关心“蒙”何以“启”，那么书词则更倾向于表现乱世中民众“蒙”之百态，从而瓦解了一般知识人简单抽象的民间想象。书词的道德追求，止步于迎合民众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求。乱世中，人人自危，心怀恐惧。广为流传的《武家坡》与赵景深提及的稀见本子《吕蒙正赶斋》，虽以大团圆剧情煞尾，但人物冲突却起源于丈夫对妻子贞洁与否的狐疑。与长泽规矩也家藏乾隆时期旧钞中《一朵浮云铺满天》《十至百花观》《颠倒古人名字》这类灵动有余、文气十足的本子相比，1931—1937年间济南茶社、布棚、席棚中所唱，固然也有轻巧之作，但唱战乱中悖伦之事与公案戏者尤多，面对书词中一个又一个阴惨故事，书词伶人与普通民众一次次以“不正经”“不般配”的名义声讨，由此获得了最大的道德满足感。书词唱本更为内在的矛盾在于：一方面，大多数书词故事的阴惨色调可被视为世俗社会秩序崩塌、人欲横行的折射，本应召唤出强有力的批判。普遍的不忠、不孝、战乱所致的骨肉分离、精神奴役下底层社会中民众的“互害”，都以其反题的形式在书词唱本中获得表现。陈三两被卖至妓院（《陈三两爬堂》）、阎惜娇抓住宋江短处誓要不念旧情敲诈到底（《乌龙院》）、继母对闰子寡几无人性的虐待（《鞭打芦花》）、薛连登年幼二子被狂风刮走对乱世骨肉分离的隐喻（《金钱计》）、于得水嫌贫爱富为退婚约设下空棺灵堂（《空棺计》），等等，皆属此类。另一方面，这些因制度之恶催化出的人性之恶不仅因主人公加官进爵或施害者良心发现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想象性解决，更在于其以最生动同时也最极端的形式让观者完成了一次对绝对的、毫不妥协而简单明了的“仪规”的精神操练。比如，“孝”作为可贵的品质，在书词中被绝对化成为一种以活埋幼子（《郭巨埋儿》）或被冻死而不能反抗（《鞭打芦花》）的信念。这种对世俗仪规的“绝对化”最终导致仪规的“硬化”，在强化仪规有效性的同时彻底将其内含的自我反省的可能性摧毁。在书词故事营构的土俗世界中，“硬化”了的道德“仪规”

一次次声讨不忠、不孝、不正经的人事，伴随这一过程，一种“青天”重回的信任感与喜悦感，一种熟悉的、“从来如此”的伦理系统的想象性复归与现实政治中韩复架式吏治实践杂糅在一起，最终发酵出此一时期民众对重回“治世”的普遍心理预期。

## 结 语

选择抗战前夕济南书词茶社勃兴这一视角，并非想要在中心/边缘或现代/传统的二元框架中试图“照亮”那些被主流文学史叙述遮蔽的“角落”。事实上，为边缘正名的操作正是建立在对中心/边缘这一结构认同的基础之上。机械论式的史观有其各自优势，亦难掩其缺陷：一元论史观选择一个有效但未必全面的核心概念并围绕这一概念剪裁史料，求其所需。比如在确定“现代化是人类历史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sup>[27]</sup>之后，普林斯顿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组织多位学者撰写了《中国的现代化》。二元论史观假定民众与精英较少分享共同的思想资源进而试图在一元论主流叙述之外寻找另起的线索。比如卡罗·金兹堡的“微观史学”即针对“心态史”忽视社会意识的阶级性差异表达不满，试图在稀薄的史料中重新发现如梅诺乔这样的意大利山民的不凡思想。中心争夺战的最终结果则是去中心化思路的形成，对“边缘”价值的重估使“边缘”与“中心”的界限渐渐模糊，以致一种反本质主义的、强调所谓多面向的方法渐渐流行起来，多元主义视野下不少研究的结论成了“举重若轻”地证明“历史的复杂性”，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区域史研究的路径依赖正在于此，材料选取的标准“降一格”后，可援用的资源越来越多，“答案式的概括”渐多而“追问式的概括”渐少，差异化或多元化难免成为了“机械复制”式学术生产的口实。无意在此用更多笔墨一一评价不同史观的优势与局限，真正关注的问题乃是如何既避免将复杂多元的历史以一元论的抽象概念进行裁剪，又能避免多元视域下材料繁多却“各自为战”难以摸清纹理的问题。袁一丹有过这样精到的认识：“给思想史裱上生活史的花边，若缺乏政治史的基底，容易变成五光十色的万花筒或软绵

绵的奶油蛋糕。王汎森虽给思想史裹上生活方式的外衣，但与新文化史的趣味不同，他感兴趣的是与近代政治生态息息相关的精神生活，而非声色犬马的物质生活。”<sup>[28]</sup>这倒并非就是说物质生活不够重要，摩登上海的月份牌、“霓虹电管广告”与遍布济南城的书词茶社自有其研究的价值。重要的是物质化生活背后关涉着的建基于人性的精神面向与具体时代的历史势能。如果说王汎森更关心“主义”时代来临前“烦闷”的时代精神状态，那么本文则要追问：基于人在面对不确定性时的非理性状态，恐惧、希望、信心是何以召唤出一种对“稳定”“热闹”生活的共鸣。要知道，破除“烦闷”，既可以在召唤新的“主义”中完成社会的“爆裂”与变革，也可能在对既有秩序强有力的复归中重获一种以稳定作为预期的希望。对于30年代的济南来说，维持这一“稳定”预期的既有强有力的统治者，也有打通了军政两界的精明商人，更有以原始道德与土俗仪规构筑的书词唱本。

[本文系山东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民国时期济南、青岛的文学生活研究（1919—1937）”（项目编号17DZJ02）阶段性成果]

[1] 参看季剑青：《重写旧京：民国北京书写中的历史与记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

[2] 鲍德威：《中国的城市变迁：1890—1949年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第16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 有关1929年青州市被确定为“特别市”、沈鸿烈就职市长后的发展情况，参看国家玮：《“画报”中的“港市想象”——以1930年代的〈青岛画报〉为中心》，《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4] 老舍：《国庆与重阳的追忆（济南通信之六）》，《华年》第1卷第31期，1932年11月20日。

[5] 爽：《韩复榘辟谣》，《抗战》第1卷第4期，1937年10月2日。

[6] 有关进德会的文化旨趣，参看国家玮：《儒教道德与治世想象——战前进德会的文化旨趣与文学生活（1933—1937）》，《东岳论丛》2019年第6期。

[7] 箫凤：《进德会露天书场阵容志盛》，《戏剧半月刊》第1卷第5期，1936年8月20日。

[8] 盼鹊：《记进德会剧场法门寺佳剧——谭富英、程玉菁杰作》，《戏剧半月刊》第1卷第6期，1936年8月28日。

[9] [10] [20] [21] [22] 吴级宸：《济南市书词界调查及其改善》，《民众教育月刊》第3卷第6期，1932年6月。

[11]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September 8 1928.

[12] 参见《济南市人口籍贯统计表》，载济南市政府秘书处编：《中华民国廿三年度济南市政统计》，第103页，1936年10月。

[13] 有关1931—1937年间中国大萧条情况的研究，参看城山智子：《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1929—1937）》，孟凡礼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4] 参见《济南市民众娱乐人数统计表（二十一年七月制）》，《济南市市政（月刊）》第5卷第3期，1932年。

[15] 参见《济南市二十一年度接受社会教育人数与本市人口比较表》，《济南市教育行政旬报》第52期，1933年。

[16] 《济南市公共娱乐场所注册暂行规则（二十年十月八日第七十八次市政会议通过）》，《济南市市政（月刊）》第4卷第5期，1931年。

[17] 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第23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8] 参看阿英：《大鼓书》，《夜航集》，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19] 参看赵景深：《大鼓研究》，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23] 此为明显误记，并非手民误排。山东大鼓有《东岭关》本子，据此推测，作者可能对鼓词不甚熟悉。

[24] 后又在“迷信”类中出现《阴功报》，但《狄仁杰赶考》、《马寡妇开店》与《阴功报》其实是一个本子。

[25]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第3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26] 参见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期，1918年12月15日。

[27]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第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8] 袁一丹：《弥散性思想：一种模糊史学》，《读书》2018年第4期。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萨支山